

# 卡里斯玛权威的衰退：711抗议事件与古巴政体的治理困境分析

唐永艳

2021年7月11日，古巴爆发了近六十年来最严重的全国性抗议。在这场呼吁政治更迭的游行中，上万人走上街头，涉及范围达全国10个省，50个城镇，抗议者高呼“自由”“我们不怕”等口号；<sup>1</sup>一些古巴民众甚至通过网络要求美国政府进行国际干预，防止抗议者成为“大屠杀的受害者”。<sup>2</sup>90英里外迈阿密古巴裔美国人遥相呼应，美媒对此事件争相报道，拜登当局公开支持古巴人站起来摆脱古巴政府的“独裁政权”。<sup>3</sup>相关数据显示此次抗议约十万人参与，<sup>4</sup>至少700人被拘留或失踪。<sup>5</sup>

尽管此抗议事件已发生多月，但其对于分析古巴当下核心问题之一，即社会体制与经济发展间的矛盾仍具有很大启发意义，是理解古巴社会变迁中国家与民众间张力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在外媒与古媒对此事件不同利益趋向的报道下，本文参照公开数据和经验性材料，以国家政体为中心从内归因，试图对该抗议事件爆发的原因提供一个整体性解释，并对古巴政体的治理困境做进一步讨论。

## 一、卡里斯玛权威的衰退

横向维度来看，主流叙事常单一化和极端化711抗议事件爆发的原因，多认为经济问题造成的粮食匮乏和药品短缺直接促成抗议发生。<sup>6</sup>部分言论简单地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对立：或笼统将之归咎于美国对古禁运封锁，以此解释古巴所有经济问题；<sup>7</sup>或归因于人们对古巴执政党的不满，表达颠覆政权的意图。<sup>8</sup>然而纵向维度分析尝试驳斥这些简化的解释路径。经济学家梅萨·拉戈 (Mesa Lago) 研究显示，古巴民众下面临的经济危机并没有苏联解体对古巴造成的经济重创严重。<sup>9</sup>这推翻了单一经济因素导致711抗议发生的论调，同时也引发了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是苏联解体时，极端经济危机下古巴民众为什么没有发起大规模抗议？（仅在1994年发生小规模“马莱科纳索抗议”(Maleconazo)<sup>10</sup>）二是苏联解体后，国家经济短缺使民众不满成为常态，在“相对剥夺感”对711抗议解释乏力下，促成这次抗议的因素与前者有何不同？本文借助韦伯“卡里斯玛权威”的概念对比两次抗议，认为711抗议大规模和大范围爆发与古巴政体卡里斯玛权威衰退相关，并在排气阀关闭和互联网接入等多因素叠加下加剧了古巴政体的合法性危机。

在进入论述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卡里斯玛权威”概念进行简单解释。“卡里斯玛权威”是韦伯论述权威体制获得合法性基础中的一类。在韦伯的理论中，理想型的卡里斯玛权威是指因拥有超凡禀赋而得到众人拥戴的领袖。与传统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不同，其合法性基础取决于被支配者对其超凡魅力的“承认”。<sup>11</sup>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权威支配者和被支配者间的动态关系决定了卡里斯玛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是否稳固，一旦被支配者取消承认，卡里斯玛权威即宣告崩溃。韦伯进而提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卡里斯玛权威通常指一些个人、组织或体制利用卡里斯玛合法性逻辑来使自己所获得的权力“正当化”和“神圣化”，以一种政治修辞和手段来获得被支配者的承认。<sup>12</sup>

用韦伯的观点看, 1959—1989年间古巴国家政体显然具有理想意义上的卡里斯玛权威。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 经历近百年民族解放运动后, 新生古巴政权终于迎来了代表广大古巴人民利益的执政党。面对美国近半个世纪代理制中留下的社会两极化处境, 新政权对于社会改造抱有极强的使命感。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代表的执政党以建立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为目标展开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依靠将占据岛上95%的美国资产国有化以及苏联的帮助, 新政权在国家建设过程中通过“国家分配”和“绝对平等”等极大的革命功绩, 赢得了占据岛上大多数的无产者的拥护和爱戴。在这一时期, 古巴民众对国家标称超凡的德才禀赋基本上是深信不疑的。

苏联解体后, 古巴陷入极端经济危机。尽管此后国家仍坚持用卡里斯玛权威来维持执政的合法性, 并用更多的实绩来证实自己的力量, 如1994年开放国际旅游市场, 2006年初步市场化改革。但由于古巴社会主义体制的“绝对公平”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发展逻辑相矛盾, 导致国家推进改革措施中不断在收权和放权中摇摆转换, 已经负荷累累的社会主义体制遭受着不断冲击, 社会不平等加大, 不稳定性增强。

2020年初至今, 新冠疫情激化了古巴民众与国家间的冲突, 进一步削弱了国家的卡里斯玛权威。据拉美经委会统计显示, 古巴经济受新冠疫情的打击远超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大部分国家, 高于地区平均值6.8%。<sup>13</sup>尽管古巴政府已将大量公共预算用于应对这场危机对家庭、企业乃至整个社会造成的损害, 但结果远不能令人满意, 古巴人民仍处于缺乏粮食、药品和生活物品的处境中。2021年的经济改革更加恶化了古巴民众的生活处境。尽管国家试图通过开放私人企业、征税、将两套货币并轨等措施打开经济桎梏, 然而这些从长远来看会产生积极成果的措施<sup>14</sup>却在“不恰当”的时间内恶化了民众与国家间的关系。新冠疫情的影响加之特朗普收紧经济封锁的措施加剧了古巴改革的阵痛, 诸如急剧上升的通货膨胀、大范围的失业率、大幅上涨的商品价格以及粮食和药品严重短缺等现象都远远超出国家预期。人们对生活苦难的不满逐渐转向了对古巴政体的不满。

## 二、两次抗议事件的对比

在此背景下再看2021年711抗议便会有不同的理解。1994年8月5日, 哈瓦那滨海大道上发生“马莱科纳索抗议”, 数千人聚集向政府要求“自由”并对执政党表达不满。值得关注的是, 抗议伊始, 菲德尔·卡斯特罗出现在示威群体中, 他将古巴的经济困境归咎于美国, 说服人们停止抗议, 并通过援引历史向抗议者讲述革命带给人民的进步, 同时允许那些不满者大规模流亡, 这使危机在极短时间内极小范围中化解。作为古巴新政权的创建者, 菲德尔·卡斯特罗遭受美国中情局634次暗杀却安然无恙的神话, 以及他在国家建设初期推进的革命措施, 使他获得了绝大部分古巴人的拥戴, 成为古巴执政党中卡里斯玛权威最高拥有者。因此, 苏联解体后的几年内, 尽管以卡斯特罗为代表的古巴执政党所做工作未及群众期望, 民众的信仰有所弱化, 但并没有完全冲淡执政党在1959—1989年间为古巴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 其在大部分古巴民众的拥护中依然能够延续意识形态合法性。

与1994年抗议发生背景不同的是, 苏联解体后的近三十年来, 尽管古巴执政党试图通过政绩来展示自己的力量, 为民众提供更好的生活, 然而持续的经济困境极大地增加了群众对古巴政体超凡禀赋的怀疑。新上任的主席迪亚斯·卡内尔(Díaz-Canel)没有切实的革命背景, 他出生于1960年4月, 大学主修电子工程, 20岁出头时加入共青团开启他的政治生涯。2018年迪亚斯·卡内尔被选举为古巴主席, 2021年当选第一书记, 在任期间古巴于2019年颁布新《宪法》, 2021年初实施经济深化改革, 短期任职内并未取得太突出的政治功绩。711抗议发生时, 菲德尔·卡斯特罗已去世近5年, 已退休的劳尔·卡斯特罗在抗议活动中未公开露面, 迪亚斯·卡内尔主席虽采取相似措施, 亲自走上街头呼吁群众抵抗暴乱, 援引革命话语安抚民众, 将古巴的困境归因于美国“窒息的经济封锁”, 但支持他的多是一些年纪较大的革命支持者。

抗议群体内部的差异和分化也加速了古巴政体卡里斯玛权威衰退。古巴政体的卡里斯玛权威是以国家对人民美好生活许诺为基础的, 1959—1989年间, 老一辈古巴人在古巴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了国家允诺的住宅、工作、教育和医疗等多项保证。这确实让一代人经历了革命许诺的美好生活, 保障了他们对于体制的忠诚和认同。如果说1994年马莱科纳索抗议的参与者只是少数偏离革命忠诚的人, 那么时隔27年, 在经济发展不前, 物资匮乏成为常态的处境中, 成长在这一时期的年轻人对革命成果的感知与老一代

古巴人有很大不同，并在旅游业的冲击和互联网互通中对当下生活愈发不满。尽管不乏美国激进分子鼓动以及利用抗议进行抢劫的罪犯参与，但古巴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也承认，那些日常生活受到危机影响感到绝望的人和那些感到权利被剥夺的年轻人占据了抗议群体的大多数。<sup>15</sup>

维持古巴政体卡里斯玛权威的一种策略是将不承认者排除在外，当下却行之无路，由此加剧了危机。古巴政府通常在国内矛盾最为激烈时打开“排气阀”来维持政权稳定。如1965年“卡马里奥卡示威”(Camarioca)中，美古政府达成协议后允许6862名希望离开的古巴人乘坐美国船只前往佛罗里达。<sup>16</sup>1994年马莱科纳索抗议中，在古巴政府允许下，仅在一个月内约34000名希望离开的古巴人乘坐自己搭建的小船逃亡美国。<sup>17</sup>这种“减压式”方式将对古巴体制不满者疏导在外，缓解了政体压力。而自2017年来，奥巴马废除了接受古巴移民进入美国的“干脚湿脚”决议；2019年特朗普加强对古巴移民的限制；2021年疫情危机下，美国内政部长亚历杭德罗(Alejandro Mayorkas)警告说，如果再有古巴人以非法方式进入美国，美国海岸警卫队会将其逮捕并驱逐回古巴。<sup>18</sup>美国拒绝古巴移民再加之新冠疫情的影响，古巴人想要移民他国更加艰难，矛盾在内部滋生恶化，加剧了古巴政体压力，两者冲突更加尖锐化。

与1994年相比，互联网的普及串联起更多不满群众，进一步冲击了古巴政体的卡里斯玛权威。1959年古巴革命后，政府便将所有媒介纳入国家系统中，对网络信息进行监管。一定意义上，这一举措维护了古巴民众对古巴政体意识形态的忠诚。苏联解体后，相对隔绝的古巴不得不参与到“新”世界体系。1994年后随着国家旅游业发展，分散和不可控的网络逐渐进入到古巴人生活中。早在2007年，古巴通信部长拉米罗·巴尔德斯(Ramiro Valdés)便发出警告“新技术的野马必须得到控制”；古巴驻华大使卡洛斯·佩雷拉(Carlos Pereira)也表示，美国长期以来把社交网络作为颠覆和破坏古巴国家政权的工具，当前社交网络已成为“思想的重要战场”；迪亚斯·卡内尔上任后“坚持对互联网和博客高强度审查，以此来保护国家免受美国多元主义的毒害”，古巴情报部队一直将互联网作为敌人的宣传工具进行制约和监控。<sup>19</sup>然而旅游业开放后的需求以及民众的呼吁迫使古巴政府在2018年开始全面普及网络，2020年古巴通信局(ETECSA)统计数据中显示，古巴已有约600万人(总人口约1100万)在使用手机网络。

互联网为反政府组织提供途径的同时，也为民众提供了新的政治参与形式。行动者的不满在强有力的宣传口号中大范围传递，引发了更多民众的激进行为。流传在网上的视频显示，在抗议发生的一个城市，一名男子拿着手机呼吁其他抗议者直播抗议画面，号召更多群众集体行动起来反抗古巴执政党。相继流传出的视频也显示，在其他抗议发生地手持手机的示威者人数众多。视频传播迅速点燃了群众的不满，并将那些心中积怨已久的民众“团结”起来，最终促使抗议大范围、大规模爆发。

韦伯认为传统、魅力和理性是人类顺从的三个基础。<sup>20</sup>不管国家通过何种方式使自己合法化，人们对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存在都包含了理性和感性的评估。对将权力集于一身的政体来说，为广大百姓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是其维持政权长期稳定的条件之一。<sup>21</sup>具体到古巴政府而言，由于国家几乎将所有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等事务都纳入到中央规划，民众对于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感知和评估已经具像化到吃穿住行用当中。尽管1994年抗议与2021年的711抗议背景相似，古巴都处于极端经济危机中，但与前者主要是由于失去苏联的援助不同，造成后者经济困境的原因被民众更多地归咎和迁怒于政府，危及古巴政体合法性的程度远高于前者。

## 结语

2021年11月15日，随着抗议组织者尤努尔·加西亚(Yunior Garcia)逃亡西班牙，711抗议事件暂时画上句点。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罕见的抗议中，古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举措将之内部分解，如立即切断网络、在暴乱发生后首先归咎于美国窒息封锁、多次援引建立在卡里斯玛权威上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民众进行安抚、调动国家官员和行政人员平复抗议等，对事态进行了有限地控制，使之没有对政权造成颠覆性威胁。抗议平复后期，政府似乎也意识到纯粹的意识形态说教无法解决古巴当下经济危机，外界援助也无法根本性解决国家内部治理困境，因而转向了敦促粮食生产、整顿市场混乱、整治市容和安全生产等各领域，期望用更多实绩来证实自己的力量。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从古巴内部视角分析政体的治理困境并不意味着站在制高点指责古巴当下领导人的不当, 恰恰是希望阐明其在做了很大努力后仍无法摆脱当下处境的艰难。随着两代卡斯特罗相继离职, 古巴政体实质意义上拥有的卡里斯玛权威已大不如前, 国家对社会的号召力不断下降。在美国不解除封锁的情况下, 各种社会矛盾在古巴转型时期只会更加突出, 711 抗议只是一个爆发点。如果无法取得有效成绩, 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将会受到持续质疑, 并在互联网普及以及美古关系破裂等因素叠加下面临更加艰巨的挑战。

唐永艳,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生, 研究国家和区域为古巴和拉美。

- <sup>1</sup> Lozano and Daniel, “Protestas callejeras en Cuba sorprenden al Gobierno, que llama a sus ‘revolucionarios’ para combatirlos”, *El Mundo*, (July 11, 2021), <https://www.elmundo.es/internacional/2021/07/11/60eb3bcbe4d4d86e758b4643.html>.
- <sup>2</sup> “El régimen cubano insta a sus partidarios a combatir la ola de protestas en toda la isla”, *El Confidencial*, July 11, 2021.
- <sup>3</sup> “Cuban people are demanding their freedom: Biden expresses support for protesters”, *USA Today*, July 12, 2021.
- <sup>4</sup> Mauricio Vicent, “Cuba vive las mayores protestas contra el Gobierno desde la crisis de los años noventa”, *El país*, (July 11, 2021), <https://elpais.com/internacional/2021-07-12/cuba-vive-las-mayores-protestas-contra-el-gobierno-desde-la-crisis-de-los-anos-noventa.html>.
- <sup>5</sup> 官方未公开此数据, 本数据参见 “5 ways Americans often misunderstand Cuba, from Fidel Castro’s rise to the Cuban American vote”, *The Conversation*, July 26, 2021.
- <sup>6</sup> 如 “Cuba protests: Frustration at government runs deep”, *BBC*, 14 July 2021; “What Is Happening in Cuba? The Protests Against the Communist Regim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7, 2021.
- <sup>7</sup> 如 “Participa Raúl en reunión del Buró Político”, *PCC*, July 27, 2021; “Díaz-Canel acusó a Estados Unidos de promover estallidos en Cuba”, *El Litoral*, July 13, 2021.
- <sup>8</sup> 如 “It’s about ‘freedom’: Cuban Americans say shortages don’t explain protests”, *NBC News*. July 17, 2021; Naughtie and Andrew, “Bernie Sanders says Cubans have ‘right to live in democratic society’”, *The Independent*, July 13, 2021.
- <sup>9</sup> 参见 Mesa-Lago C, Vidal Alejandro P: *El impacto en la economía cubana de la crisis venezolana y de las políticas de Donald Trump*. línea Real Instituto Elcano, DT 9, 2019; 另见 Mesa-Lago C, “Crisis económica, sus causas, el COVID-19 y las políticas de rescate”,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y Estratégicos*, (June 10, 2020), [http://www.realinstitutoelcano.org/wps/portal/rielcano\\_es/contenido?WCM\\_GLOBAL\\_CONTEXT=/elcano/elcano\\_es/zonas\\_es/ari83-2020-mesa-cuba-crisis-economica-causas-covid-19-y-politicas-de-rescate](http://www.realinstitutoelcano.org/wps/portal/rielcano_es/contenido?WCM_GLOBAL_CONTEXT=/elcano/elcano_es/zonas_es/ari83-2020-mesa-cuba-crisis-economica-causas-covid-19-y-politicas-de-rescate).
- <sup>10</sup> 20 世纪 90 年代, 苏联解体后古巴陷入到特殊时期的经济危机中, 民众生活陷入极大的困境, 在 1994 年 8 月 5 日, 在古巴哈瓦那的滨海大道上发生马莱科纳索抗议, 当天即得到有效平复。
- <sup>11</sup> [德] 麦克斯·韦伯: 《韦伯作品集: 支配社会学》, 康乐、简惠美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269 页。
- <sup>12</sup> *Ibid.*, p.329-332.
- <sup>13</sup> 拉加经委会统计数据 (2021) 显示, 古巴 2020 年国民生产总值下降 10.9%, 高于地区平均值 6.8%。数据参见 [https://statistics.cepal.org/portal/cepalstat/dashboard.html?indicator\\_id=2207&area\\_id=131&lang=en](https://statistics.cepal.org/portal/cepalstat/dashboard.html?indicator_id=2207&area_id=131&lang=en).
- <sup>14</sup> “La economía cubana ante el COVID-19”, *Cuba News*, June 4, 2020.
- <sup>15</sup> Lozano, Daniel, “Protestas callejeras en Cuba sorprenden al Gobierno, que llama a sus ‘revolucionarios’ para combatirlos”, *El Mundo* (in Spanish), (July 11, 2021), <https://www.elmundo.es/internacional/2021/07/11/60eb3bcbe4d4d86e758b4643.html>.
- <sup>16</sup> Copeland, R, “The Cuban Boatlift of 1980: Strategies in Federal Crisis Management”,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467(May 1983), (July 28, 2021), <http://www.jstor.org/stable/1044933>.
- <sup>17</sup> Batista, Carlos, “Protestas en Cuba evocan ‘El Maleconazo’, 27 años después”, *La Nación*, <https://www.nacion.com/cables/protestas-en-cuba-evocan-el-maleconazo-27-anos/R3FIBTLO4BEO3FZJSUHHQFG5KU/story/>.
- <sup>18</sup> “Homeland Security chief says U.S. will not give refuge to those fleeing Cuba and Haiti by boat”, *CBC NEWS*, (July 13, 2021).
- <sup>19</sup> “Assessing the Current Dilemma in Cuba”, *NACLA*, May 4, 2018.
- <sup>20</sup> 麦克斯·韦伯, *op. cit.*, p.28.
- <sup>21</sup> 周黎安: 《转型中的地方政府: 官员激励与治理》,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08 年, 第 67 页。

《区域观察》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海淀区清华园 1 号

中国, 北京 100084

清华大学中央主楼 205 室

电话: +86-10-62787747

官方网站: <http://ias.tsinghua.edu.cn/>

协调人: 张静

本期执行编辑: 李宇晴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辰熹、石靖、杨崇圣、周燕、段九州、袁梦琪、

傅聪聪、雷定坤、熊星翰

未经授权, 请勿转载, 引用请注明出处。